

开·卷·书·坊

回忆中的师友群像

钱伯城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开·卷·书·坊

回忆中的师友群像

钱伯城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回忆中的师友群像 / 钱伯城著. —上海: 上海辞书出版社, 2015. 8

(开卷书坊. 第4辑)

ISBN 978-7-5326-4416-2

I. ①回… II. ①钱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40704 号

回忆中的师友群像

钱伯城 著

责任编辑/霍丽丽 装帧设计/朱赢椿

技术编辑/顾 晴 责任校对/杨桂珍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辞书出版社出版

200040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www.cishu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

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20 毫米×1000 毫米 1/32 印张 6.875 字数 88 000

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6-4416-2/I·266

定价: 32.00 元
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512—68180638

回忆中的师友群像

书前闲话

这本小开本的小书，系应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室主办，并广受读者欢迎亦我所喜的《开卷书坊》丛书之约，从历年所写曾在报刊发表或编辑出版的文史随笔内选录十万字上下、选文若干篇而成。书名《回忆中的师友群像》，其中出现的人物，有相识的，有不相识的，但精神、思想是相通的，都是我所敬佩、尊重的师友之交。内容大致是大时代或大环境中小故事、小掌故之类的小品文，或大文章中套点小文章；涉及的人和事，概从实录，不作虚语。

以上说的几句闲话，权当一篇小序，读者看了自有理会。以“开卷”为卖点的书，自应开卷有益，此不待词费。能否做到，要听读者评论，不能自以为是的。

九四老人 钱伯城

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，识于上海观景楼

目录

- 001 元化先生二三事
- 016 学术精神与前贤风范
- 023 端直骏爽 风骨峻嶒
——我认识的朱东润先生
- 031 记余振
- 044 物外人间一诗人
——怀潘伯鹰先生
- 053 宋云彬北京日记
- 062 沧桑饱经征交谊
——怀陆澹安先生
- 073 往事回首怀罗老
- 083 子展先生二三事
——为陈子展先生百年诞

辰作

- 088 怀老报人许君远
- 093 老报人徐铸成
- 106 怀故友杨廷福
- 111 李平心之死
- 118 记潘伯鹰
——兼论潘著文言小说《寒
安五记》
- 141 出版局长遭难记
- 156 改造:潘光旦一生的追求(上)
- 164 改造:潘光旦一生的追求(下)
- 181 潘光旦的旷达与谐趣
- 188 桑榆闲话
——兼怀苏渊雷先生
- 192 亦开风气亦为师
——为胡适一辩
- 196 半个世纪的雪泥鸿爪
——琐忆新文艺出版社一
点往事

- 201 为《胡道静文存》出版写的推荐书
- 204 “书窗”外的闲话
——《三月书窗》代序

元化先生二三事

“二三事”之一：章鲁王的承传关系

这篇题目，识者一看便知，套自鲁迅那篇传诵甚广的《太炎先生二三事》，只是章太炎换了王元化。如今写回忆某人往事，“二三事”已成时髦用词，但我觉用在王元化身上似更见合适。章太炎与鲁迅有师生之谊，鲁迅则是王元化青少年时期的精神与思想导师，章太炎——鲁迅——王元化，他们之间的确存在绵延不绝的承传关系。他们是所处不同历史时期具有浓郁启蒙主义色彩的哲学家、思想家，又是当之无愧的文学语言大师，忧国忧民，以天下为己任，走在历史的前沿。王元化更是在他的晚年公开亮出了“新启蒙”旗号，并创办了虽仅印了四期而影响深远的《新启蒙》杂志。他们留下的著

作，先后辉映，旗鼓相当。读者甚至可从《王元化晚年谈话录》（下简称《谈话录》）中看到章、王二人之间跳越鲁迅的直接呼应。三人间各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，这正是王元化通过三次痛苦的也是理性的“反思”所形成并坚持的信念。由他的一位博士生吴琦幸君记录的《谈话录》，谈论和探讨的就是这些问题。因此在接触王元化的“二三事”前，让我们先看看这本《谈话录》的内容及问答体例大概。

首先，这是一本为研究王元化生平思想、学术成就及时代背景等提供第一手资料的书。这里举一条为例，当问到他出生于基督徒家庭，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，本人也受过洗礼，对他有哪些影响时，他回答：“影响当然是有的，最重要的是关于人不是神，人不是万能的。”接着又更详细叙述了父亲、外公以及圣公会和教会学校同他家庭的密切关系，最后说：“基督教对于中国教育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，只是这方面的研究太少。”这种袒露心怀的告白，可以促使我们思索这样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基督

徒家庭和教会学校竟培养出如此众多的无神论和反传统的革命战士,而且是其中的精英分子?诸如此类,为后人提供了足够研究的空间。

其次,这本《谈话录》不像当前一些口述史或记者访谈那样一问一答,直来直往,而是夹叙夹议、带有动作表情,时有第二者参与的描写。这里摘录本书《前言》末段的话:“他(指王元化)希望我(记录者吴琦幸自称)多花点时间跟他促膝漫谈。由于他的三次反思及一生都在他著作中详细分析和做过论述,所以他这次谈话的风格是提纲挈领的漫谈,特点是无话不谈……清晰地画出他的心路历程……遵照他的要求,我没有采用完全对答的方式,而是通过自己的观察、思考,与他对谈,并写下了我的心情和理解。我希望这次完成了先生交给我的最后的一个任务,也是我写的最长的一篇读书报告。”

最后再补充一点,我看这本《谈话录》所以成功,还得力于记录者的文史哲素养追求,此亦见于本书《前言》:“跟他(王元化)相处不一会儿,就会从他身上感受到一种真诚和儒雅之气,一段话突然在

我(记录者自称)的脑海中腾起,那是《歌德谈话录》中艾克曼第一次见歌德时候的印象:‘他坚毅有力的褐色面孔满是皱纹,每一条皱纹都富有表现力。他的整个神情是如此诚挚而又坚定,宁静而又伟大!他说话缓慢、安详。谈吐如同我们想象中年事已高的王者。看外表便知道他气定神闲,已然超乎于世间的毁誉之上。’”按:《歌德谈话录》解放前有老商务译本,解放后重版,手边无书,此段译文或为新译。

“二三事”之二:“被打成胡风 反革命分子的真实情况”

按照王元化自己的安排,这次“无话不谈”的多日漫谈,从理论、人情、学风、考证、历史事件以至三次“反思”中,他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的真实情况这一历史事件,放在领前的位置。这是他一生思想的重大转折点。时间是二〇〇年七月十七日,地点是上海瑞金医院高干病房。下面是《谈话录》的记

述(四十六至四十九页)：

我扶王元化先生到医院的走廊里，先生的身体靠着我，我感到了先生的虚弱，我们用非常慢的脚步踱步，走廊中只我们单独两个人贴在一起。

先生感慨地说，琦幸啊，我想我给你讲一下一些不宜发表的历史，你要答应我，要等到我眼睛闭上之后才能公开。我点点头。

先生喘着气慢慢地说，那就是在反胡风的时候，胡风曾经说过“对于王元化要拆穿他”。

我想起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三批材料中，胡风针对王元化说的“必要时拆穿他”的话语，我就问，这是什么意思？

先生慢慢说，拆穿他，这是怎么回事，没有人懂，我不讲，没有人知道。这是胡风给罗洛一封信里讲的。

先生几乎是贴着我，说，胡风这个人的宗派思想非常厉害。……我那个时候弄新文艺出版社，出一些书。胡风那个人宗派意识很强。

他们只是要把胡风一派的书可以出，别人的书都不可以出。他们想出天蓝的一部诗集，后来华东文化方面的主管部门不让出，说其中有些问题。他们不服气，我也跟他们说，这是不能硬来的，要按照组织原则。但是他们不大懂。他们就写信给胡风，说王元化不愿意斗争。……于是他们说我是两面派，对领导不提意见，实际上心里是有意见。这就是要“拆穿他”的意思的由来。

按：在当年公布的《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》中，上海新文艺出版社被点名的共有三人，除王元化，还有罗洛、张中晓。王元化说“我那个时候弄新文艺出版社，出一些书”，他那时做的是总编辑，社长是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刘雪苇兼任，后升任中央文化部副部长，也成为“胡风分子”。关于王元化，我曾在一篇回忆短文中，提到他早期给我的印象：“他是我到新文艺出版社第一位接见的领导人，平日接触不多。但记得有次参加他主持的一个小规模编辑会议，讨论选题计划。正好大热天，不像

现在到处空调，电扇也不普遍，他穿一件汗背心，慷慨陈词，大有脱略形骸的书生意气。在座的还有张茜（陈毅市长夫人），她是翻译编辑，曾用‘耿星’笔名译过一本绥拉菲摩维奇的短篇小说集；她也发表意见，一口四川话，侃侃而谈。不过会上各人讲些什么，一点记不起了。”（《半个世纪的雪泥鸿爪》）

关于罗洛与张中晓，在他们被“隔离审查”前，那倒是天天见面的。开头是在一个办公室，文艺编辑室，我去之前有六位：主任梅林，编辑耿庸、罗洛、张中晓、江鹜、翟永瑚；我加入后的座位排列是，梅林单坐一张办公桌，罗洛与我对坐一桌，耿庸与张中晓、江鹜与翟永瑚也各对坐一桌。罗、张、翟还与我同住一个宿舍楼，晚间与节假日时有会面。但不到两年，胡风案发生，这样相对平静的格局就告结束。不过老同事又是老朋友的情谊，是始终断不了的，至今我还不时想起他们。

对王元化，我与他的相知与交往，又自不同。他是老领导，又是兼备师友地位的老朋友。胡风案后，他被隔离审查随即离开新文艺出版社，几无往

来。“文革”结束后,他先主持《大百科全书》文学卷编撰工作,后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,兼管上海古籍整理出版一块,我都做他的助手。平时过从,相敬以礼,谈的多是公事,偶尔提及往事。记得有一次他说起曾中夜起身跑上阳台,仰天捶胸长嚎的事,我听了很受感动。我也曾有过这类举动,那是大冷天,半夜起身,只穿短裤汗衫,偷偷开启宿舍大门,在所住里弄来回奔跑,希望立刻伤风咳嗽、体温升高,第二天好上医务室混一张病假单,心情境界差得远了。元化此类事未见于这本《谈话录》,大概尚未想到这是当年涉案者的一种心路受难历程,无论是否曾与记录者谈过,都是值得一记的。

二〇一四年一月号的《随笔》杂志登载的彭小莲《如果胡风当官了……》,引用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《东方早报·上海书评》发表的二〇〇七年吴琦幸与王元化的访谈录,谈及王的思考和观点,特别是王说的“胡风这个人我是不喜欢的,如果他当了文化部门的领导人,可能比周扬还更坏。这些东西等我闭上眼睛再发表吧”这段话。然后写下

了她与罗飞、何满子和她自己的意见：

文章发表的第二天，我就接到罗飞先生的电话，他问我是否看见了吴琦幸的访谈，他几乎不能相信，王元化先生说了这样的话，……但是，我跟罗飞先生说，这话断然是王元化说的。……早在2002年的春天，我去衡山路的庆余别墅看望王先生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说了同样的话。……我不知道如何反驳王先生观点，……于是，就直接去了何满子先生家里。何先生非常不屑地回答道：

“这不是胡扯吗？历史，是可以有‘如果’的说法吗？”

按：我知彭是同与王元化成为“胡风分子”的原华东局宣传部长彭柏山的女儿，我与她的母亲朱女士曾在王元化家偶遇，朱当时似正为《新民晚报·夜光杯》写唐诗今译专栏。罗飞与何满子则是我所在出版社的老同事、老朋友。我所不解的是，他们何以如此“纠缠”与激烈反对元化关于胡风与周扬比较“如果胡风当官了”的观点？这到底是学术还